

百年中国记忆·教育家丛书

贫弱的中国曾有这样一类人：  
生于封建时代，却有进步思想与崇高精神，  
从幼稚园、中小学到大学，  
从最高学府到田间地头，  
他们在教与学中耕耘，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  
他们是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家！

先 生 归 来 兮

陶行知，人生为一大事来

先生归来兮

刘未鸣 韩淑芳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 陶行知，人生为一大事来

陶行知 吴树琴 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先生归来兮. 陶行知, 人生为一大事来 / 陶行知等

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10

(百年中国记忆. 教育家)

ISBN 978-7-5205-1283-1

I. ①先… II. ①陶… III. ①陶行知 (1891-1946)

—纪念文集 IV. ①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90646号

执行主编: 张春霞  
责任编辑: 牛梦岳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1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陶行知 (1891—1946)



1917年陶行知（右一）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左二）等人合影



南京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礼堂——犁宫



陶行知勉励小学生好好学习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合川草街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图为部分育才师生在古圣寺大门前合影

捧着一顆心來  
不帶半根草去

陶行知

陶行知手迹



陶行知夫妇与友人在重庆北碚北温泉合影（左四为陶行知，左三为吴树琴）

# 目 录

<b>第一辑</b>	<b>成才之路：从穷孩子到洋教授</b>	<b>001</b>
	追求真理做真人	002
	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	025
	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	038
<b>第二辑</b>	<b>革故鼎新：平民教育与晓庄岁月</b>	<b>049</b>
	新教育	050
	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060
	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	069
	在南京燕子矶小学	074
	晓庄师范学校忆往	080
	先生二三事	087

晓庄师范与联村自卫团	096
“锄头歌”的产生	103

**第三辑 —— 晓庄之后：普及教育与国难教育** **111**

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112
普及什么教育	114
从教育上谋国难的出路	116
回忆陶行知先生	120
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	127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一个缩影	135
陶行知先生哺育下的安庆幼童工学团	141
陶行知二十六国行	148
陶行知在国外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片断回忆	162

**第四辑 —— 烽火书声：战时教育与育才学校** **165**

抗战的全面教育	166
育才学校创办旨趣	171
我与行知在北碚	175

陶行知先生在北碚	180
陶行知先生和育才学校	185
育才好比一盏灯	193
沥尽心血培育人才	199
抗敌儿童画展	208
育才的舞蹈活动	213
于平凡中见伟大	216
<b>第五辑 —— 民主之魂：民主的教育与民主的国家</b>	<b>221</b>
民主教育之普及	222
怎样可以得到和平	225
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227
爸爸去世前后	233
临危不惧，生命不息	236
<b>附录一 —— 陶行知教育言论精选</b>	<b>245</b>
<b>附录二 —— 陶行知先生生平简介</b>	<b>265</b>

第 一 辑

---

成才之路：  
从穷孩子到洋教授

---

## 追求真理做真人

陶晓光

1891年10月18日（旧历九月十六日）父亲诞生于徽州的一个衰落的农村里——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家境清寒。祖父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人，祖母种地，做过佣工，持家非常勤俭，连剃头都是她一人包办。她剃过祖父、父亲的头，剃过我们兄弟四人桃红（陶宏）、小桃（晓光）、三桃（陶刚）、蜜桃（陶城）的胎头。1934年祖母逝世后，父亲感情深重地为遗下的这把最可纪念的剃刀写了一首诗：

这把刀！  
曾剃三代头。  
细算省下钱，  
换得两担油。

父亲幼年，祖父送他上经馆读书，因家贫常打着赤脚，但天资聪敏，勤奋好学，过目背诵，有过人的记忆力。后进了歙县城里基督教内地会办

的崇一学堂，由于学习好，提早一年毕业。他17岁之春，独自一人离乡乘帆船去杭州学医，后又考进了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他受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革命思想感染，在校是个活跃分子，主编《金陵光》学报，组织爱国活动。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良，他得以提早一年修完大学课程，并以第一名毕业。

这时全家已移居南京，他和妈妈汪纯宜结了婚。当时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风行，他持“十扣柴门一扇开”的希望，借得了去美留学的旅费。父亲在美学习，因贫困不得不在课外时间劳役、卖文、卖讲以换取学费和生活费。他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得政治硕士，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得教育硕士，奠定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愿。在归国的船上，一些留学生交谈回国的抱负，他说他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是1940年左右一个晚上在重庆北碚谈心时，有朋友问他时说的。

父亲生长在清寒的家庭里而能够进学校受教育是很不容易的。而祖父为了父亲上学校，毅然断绝了自己的嗜好，终于因年高体弱而倒下去。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儿子上进的精神，使父亲感动极深。祖母讲，当时父亲初次离乡去杭州，祖父送他上船，船开后，父亲忍不住背转身，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后来在留学期间，得知祖父去世的噩耗，热泪涌流，无法排除思家念父的情怀，就发愤努力，埋头学业，课外即到图书馆中看书到深夜才踱回宿舍。

父亲回国即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长，后改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几十年前，留学回国的大学教授，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几个孩子幼小时在家里的确享受了一些为儿童所应有，但只有极少数中国儿童才有的幸福。每逢星期日或什么假期，父亲总是带陶宏和我去爬山玩水。逢年过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他总要买一些巧克力糖、玩具和书籍给我们，这是

我们最快乐的日子。这个习惯一直继续到他办了晓庄学校为止。我们在他身边时，每逢圣诞节吃了晚饭后，他就出去买礼物，我们躺在床上静等圣诞老人从天而降，有时等得实在不耐烦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时，一点亮光都没有，心想“老头子”今晚大概来过了，赶紧伸手到床头和枕下一摸，可不是！硬的，软的，方的，圆的，心里好生喜欢，可惜看不见，唯有希望天快点亮，就又抱着这些欢喜，慢慢地睡着了。他如果不在身边时，到了圣诞节前，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什么的从别处寄来，里面事先都分好了，写了名字，这不是怕我们抢，而是表示他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我们四个孩子从来没有为糖果、玩具打架吵嘴。

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抗战中有一年夏天，我们在育才逸少斋（父亲和来客住的屋名）。父亲招待一位在江苏医学院学习的昔日同乡的孩子章克安时，父亲说他17岁那年和章君的父亲进了杭州一个什么教会医学院，该校规定凡在教的学生可以享受两年实习的机会，但非教徒则无这权利，这大概是以实习为饵引诱加入基督教之意。章君的父亲是基督徒，当然可以享受这个权利，但父亲以此规定太不合理，学校岂可因学生信仰不同而不同待遇！他没有因此加入基督教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杭州。

假如说基督教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大概是他对耶稣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的景仰，在早期恐怕就是圣诞节给孩子们送点儿喜欢的礼物。以后从办晓庄师范起，他变成了更多的不幸儿童——那些终年得不到一点快乐的穷苦孩子，大家所共有的圣诞老人，并且号召更多的大人来做集体的圣诞老人，只不过日子改到儿童节、春节或学校的校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的儿童节，虽然任务那样繁忙，也没有忘记为乡下苦孩子的儿童节发起要给他们“一天的快乐，一年的学习”的活动。在重庆捐了不少捐款、书

籍、文具、糖果、药品。这一年儿童节管家巷有 500 个孩子参加，古圣寺育才校本部有 1000 人，化龙桥和高峰寺各有 100 个孩子，南京晓庄余儿岗小学，上海山海工学团和淮安新安小学还未计算在内。

1923 年我 5 岁时，父亲改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全家搬到北京。在这之前，在东南大学时，他开始发动学生利用假期、晚上办识字班。他奔波于平民教育推进的工作，采用的是他和朱经农编的平民千字课。推动广泛办平民夜校、识字班和平民读书处。每一个识字的人家都可以成立一个平民读书处来教这一家内和邻居的不识字的人。我们家搬到北京后，为了响应平民教育的推进和起示范作用，在家门口也贴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纸招牌。祖母那时已 57 岁，她受父亲提倡平民教育的影响，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完平民千字课。父亲和姑母都忙于推广平民教育，没有空闲教她，那时我才 6 岁，刚读完第一册，就让我当“小先生”，教祖母读书。我和祖母一面玩一面读，情绪很高，一个月就把第一册读完了。读到 16 天时，父亲依据千字课上 16 课以前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祖母，她居然能毫无错误地读了出来。我这个“小先生”的试验，给父亲很大的启发，依传统的观念，教育只是成人对小孩之行动，他们忽略了另一面的事实——小孩也能教大人。在中国国家这样穷，师资又缺乏的情况下，要普及教育，“小先生”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这件事增加了父亲对普及教育的自信，在普及教育运动中采用了“小先生制”作为一个很有力的办法。祖母学习得很有兴趣，也非常用功，一闲下来就读。她的书本放在梳妆盒里，一不懂就问我们。她除自己学外，还鼓励家里的用人也读书，自己还教她，做“即知即传”的工作。祖母的学习一直坚持到去世。1936 年父亲出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他做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的报告，最引起注意的还是“小先生制”，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剥削被压迫民族普及

大众教育的好办法，印度和加拿大等代表尤感兴趣，印度代表还坚决要求父亲到印度去演讲他的教育主张。后来父亲到过印度，甘地在会见他时，请他对正在中国开展的著名的大众教育运动作一文字介绍，父亲写了，发表在印度的 Harijan（大概是“贱民”之意，可能是周刊）1938年10月29日、11月5日和11月19日，甘地在按语中写道：“……不得不认为对我们印度是有帮助的。”

我们四个兄弟孩提时代的教育，是由姑母负主要责任的，她的文化比妈妈高。父亲在南京做教授，到后来因为从事普及教育运动和其他工作，很少能对我们负教育责任了。到北京以后，他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事业，到处奔波，使我们父子间的接触更少了，普通的父子关系在我们之间似乎逐渐淡薄，这种变化从父亲1923年的家信中可以看得清楚。父亲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这些话意味着父亲下决心要放弃个人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很高的经济待遇而回到人民中间去，为人民谋福利和解放。

父亲所以能够致力于各种创造性的事业，本身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他无家庭后顾之忧。他得到祖母、姑母、母亲的全力支持，分担了他不少重负，这是受父亲感召的结果。她们在七年内，相继地倒了下去。

有人说父亲对我们孩子的教育态度，刻薄点说是听其自生自灭，说好听些是自由生长。其实一个对教育事业具有那样热忱的人，岂有对自己亲生孩子冷落之理！只是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比我们更需要关心的老百姓、青少年和孩子需要他关心，他实在没有多少工夫再来管教我们。但是

只要有时间，他是一样过问的，特别是大一些的问题，他也是很关心的。他对我们提出希望他帮助的事，只要是对的，有助于我们进步的，他无不给以全力支持。他对我们的教导常常是很精辟的，而我们对他的主张、事业、为人也是极崇敬和倾全力去支持的。即使不能帮助他做多少工作，却也不愿分散他的精力。所以我们的关系已经跳出了世俗的父子关系，他成了我们的导师、朋友和同志。因此我们和他的关系在形式上似乎很疏远，远得甚至还不如他的学生、一般青年和朋友，但我们还能站在一般青年中学习他，接受他的指导，进而支持他贯彻他“爱满天下”的夙志，使他的事业成为我们大家的事。这样我们之间又变得极为亲密，形式上似乎淡薄，而却又很浓厚。这也是父亲的教育和为人的成功之处。

1927年前后，父亲放弃了他高等华人的地位和优越的待遇享受，到南京乡下去筹办晓庄师范，搞乡村教育运动。父亲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尽管父亲给家里来信说他身体和精神都好得很，还风趣地说：“正月初四试验乡村师范行立础礼，请城里的人下乡拜年，他头晚就下乡，住在一位姓陆的农友家里，打地铺，睡在稻草上，暖和得很，比钢丝床还有趣。”特别是说到“我们六个人睡在一铺：……还有一个你们猜是谁？……你们怕是猜不着的。待我说来。他是一条耕田的水牛，睡在我们旁边，脾气很好，也很干净。第二天教育厅长到了，陪客的也是这条牛大哥。”家里知他吃苦很不放心，很想念他，几经催促，他才不得不寄一张相片回来，消瘦多了，家里很难过，姑母背着人饮泣，决定全家要由北京搬到南京乡下去与父亲共甘苦。姑母、妈妈还